

教的早期歷史，但這明顯是苛求於作者，況且作者也明確地告訴我們很難找到關於南嶽地區早期住民的信息，除了火神祝融是顯示楚文化的線索，所有古代的遺跡都埋沒在佛教和道教湧入後留下的大量遺存中。

陳瑤

廈門大學歷史系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By SI-YEN FE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0. 361pp.**

《談判城市空間：城市化與晚明南京》是一部關於城市化的研究，探討的是城市不斷擴展的角色和功能，是如何引導城市的觀念被重新設定、爭辯和重新構想。作者要討論的不是城市設施的建設或規劃，而是城市空間怎樣在行政和文化秩序上被定義和使用。作者試圖對話的問題有三個層面。

一、從韋伯的東西方城市論到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的城鎮論都是從長時段角度出發，作者認為城市化不是伴隨長期商業化自動衍生的副產品，而是一個被不同王朝的制度和文化的不斷塑造的過程。故而應該採用以「王朝」為中心的方法來考察城市化。

二、在城市化的文化影響上，作者認為牟復禮(Frederick Mote)的城鄉連續一體論中講到城鄉連續一體在中國人心理上普通存在，並阻礙了不同於鄉村的傳統的發展。但緊接着作者就指出這種觀點的局限性，一是制度上的鄉村偏向並未像牟復禮所想的那樣抑制城市的政治覺醒；二是近年學者們的研究已經證明隨着人文和物質資源增長，城市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是明顯區別於鄉村的，只是通過一套鄉村的話語來表述以致掩蓋了城鄉的區別。

三、在城市化的政治影響上，作者回顧羅威廉(William T. Rowe)在漢口研究中提出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到韓書瑞(Susan Naquin)在北京研究中提出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認為中國城市自治不是存在於源自國家權力機關的獨立形式，而是存在於國家代理和城市居民的談判協調中。

全書採用以小見大的方法，將微觀的南京城的四個案例與宏觀的明代王朝如何應對城市化問題相結合，意圖勾勒出城市作為一個城牆內的社區、一個大都市的區域、一個想像的空間以及一個敘述的主體之變化。

第一個案例「我們一定要被徵稅」，從1607年南京居民到官府請願要求改「火甲」為徵收賦稅這一不尋常的事件開始講起。作者認為明初賦稅的核心集中在鄉村中農業土地的擁有量上，這一標準也被應用於城市。與宋元兩朝極不相同的是，明代沒有正式建立起明確評估城市財富的標準，但這並不意味着城市不需要承擔賦稅。相反，因為沒有確切標準，城市居民承擔的賦役，特別是在「一條鞭法」普遍在鄉村推行後，往往比鄉村更為繁重。那麼晚明城市是如何應對的？作者通過「南京火甲改革」的案例討論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廣泛的民眾參與，二是新興的城鄉區別。作者認為「南京火甲改革」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南京御史丁賓為了達到取得民眾「公意」的目的建立了一個分為五步的構建共識的機制。而如何克服制度上原本已經存在的鄉村偏向？這就取決於如何確定稅率的問題。「南京火甲改革」中採取的是請願者自願在「五城鋪冊」登記稅率，這些信息最終成為新的城市財產稅——房號銀——的徵稅基礎。至此作者發現，促使城市土地稅再生的不是經濟活動，而是為了克服以農村為基礎的財政體系的普遍需求。明代城市財政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始終沒有受到制度上的關注，沒有成為「一條鞭法」的正式組成部份。但是，確認城市財產以作為徵稅的目標意義重大。它使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明代體系以鄉村為中心的偏向是不恰當的，以及用獨立方式管理城市的需要。在這個意義上，南京城新稅種的設立，為原本設定為鄉村社區的明代政治圖景再造了城市空間的觀念。

第二個案例「築牆還是不築牆」，通過應天府下的高淳縣和江浦縣反抗修築城牆的成功與否，試圖討論城市和新興市鎮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城牆不單是城市最顯著的建築特徵，更是行政城市和商業市鎮兩種城市系統的明顯邊界。江浦建縣於明初（14世紀中期），高淳建縣於15世紀，兩個新興縣都坐落於沒有城牆的商業市鎮。16世紀海盜的襲擊引起朝廷對修築城牆的重視。基於財政與人力的考慮，大部份沒有被海盜直接襲擊的地區都反對築牆，但只有高淳縣的反抗成功了。經過對高淳縣建縣後歷史的梳理，作者發現表面上看來是詳細的預算和地形有力地證明高淳縣在財政和地理空間上是不可能築牆的，而深層的原因卻是植根於地方經濟的衰落和對分縣的不滿。而江浦縣未能成功反抗築牆，則是由於其對南京城的重要戰略地理位置。作者進而指出這兩個縣的案例正好揭示了在同一王朝圖景中兩種城市體系的交集。江浦縣順利承擔起作為南京城軍事後盾的角色，同時繼續擴展它的商業範圍。與之相反，位於南京大都市南端的高淳縣在政治和商業上均失去了優勢。這些失敗促使地方人士質問高淳作為一個縣城的地位並反對城牆的修

築。最終，築牆的命令被取消了，而高淳仍是個沒有城牆的縣。正是由於當地居民的積極性，致使帝國空間觀念中一個關鍵因素作出協調和修正。

第三個案例「想像南京：一個譜系」，通過《金陵圖詠》的增訂編纂過程展示兩種不同視角對南京城的想像。一種是圖考，作者認為創作於明初的《洪武京城圖志》所展示的是明太祖對南京的想像。它的城市多重投影創造性地形象化了複雜的自然城市空間。陳沂的《金陵古今圖考》則涵蓋了明代南京之前持續的南京城歷史，將南京重塑為一個歷史的產物。另一種想像是南京的行旅指南，作者認為到了晚明，國家和歷史的無所不在被大量強調地方特色的旅行文學和地形藝術作品所遮蔽。在社會旅行的影響下，對景色的欣賞蘊含着身份的認同，每個「景」的產生都蘊含着地方團體的運作。在這種趨勢下，公共場所的產生越來越多地融入了個人的目的。如同《金陵圖詠》所展示的，個人甚至家庭的歷史被寫進了地方的想像中。《金陵圖詠》通過圖像中多重的「次空間」集中關注空間和空間體驗，不單為讀者提供了關於景觀的指南，還標識了一系列城市空間變化的關鍵時刻。作者最後指出朱之藩對《金陵圖詠》的編纂使這兩種不同想像得以溝通和重組，令它們成為南京一對相對的圖景，一種代表着洪武皇帝中央集權的想像，另一種則是南京本地精英的想像。通過《金陵圖詠》，朱之藩完成了將南京從作為一個皇都轉變為一個南方都市的想像空間。

第四個案例「當代人口耳相傳的南京」，通過顧起元的《客座贅語》和周暉的《金陵瑣事》這兩本客談探討作為話語主體的城市是如何被構建的。作者認為客談的出版是晚明的一種重要文化現象，它使人們更為廣泛地接觸他們的社會。此外，人口流動的增加也影響到城市社區的內部運作。特別是持續遷離鄉村進入城市的士紳，成為了南京繁榮的社會基礎。客談中的信息有助於考察城市生活體驗如何影響到文人的政治和文化傾向，甚至他們的身份。顧起元用「主」和「客」兩個概念將頻繁流動的南京城分為五個區域。「主和客」也揭示了由過時的移民控制政策所導致的對移民不斷增加的社會緊張。借助傳統的「風俗」分析，顧氏認為在鄉村土地的肥沃或貧瘠決定了農民的生活方式，而在城市則取決於城市中不同區域「主」與「客」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資源。由此，顧氏將城市管理轉變為一個社會實踐和互動，且明確區別於鄉村的構想。基於此，作者認為城鄉的區別不是制度上強加的，而是植根於明顯帶有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色彩的城市日常生活體驗。

作者指出第一、二章的案例都顯示積極的地方的主動性和高水準的社會動員：市政廳會議（town hall meeting）被召集來調查公眾的意見；小冊子和

傳單被傳播以影響地方公議。這就回應了韋伯的「東西方城市論」中東方城市沒有自治性的問題。作者認為中國城市概念的邊界是在持續變動且開放協調的。因為執行鬆散的國家政策需要地方的合作，這就打開了一個服從於地方主動性及利益，並可以在行政上談判的空間。城市自治不是來自國家和社會的對抗，而是來自於國家代理與當地居民共同合作以達到共同目標的需要。新的社會需求對國家施加壓力，促使現存的制度作出調整以適應持續出現的城市社會。

在文化談判方面，作者認為缺乏明確城市主題的文藝傳統不應當被誤解為城市文化的惰性。相反，該書的後半部份顯示，晚明時期見證了當時充斥着城市生活活力的全新城市空間的感知或觀念。這些觀念上的革新被用於原有的文化實踐中，而非創建獨立的城市風格和圖案。客談等作品中所強調的城市社交就反映出它們是持續加強的城市社會生活的產物。但與城市相對應的整個變化軌跡，不是試圖建立獨立的城市管理或文化傳統，而是改良與修正現存的制度和文化實踐。

最後，作者總結到城市化不僅為中國景觀創造了更多更大的城市，而且推動了整個國家和社會重新去思考、表述一個位於中央集權的鄉村帝國中的城市。

綜上所述，該書秉承「新文化史」研究取向，將城市觀念作為研究的中心，討論在晚明城市化現象已經出現的情況下，人們如何在行政、文化上進行相應的調適。前半部份給讀者展示的是城市如何積極爭取自身在行政體系上的權利，後半部份則詮釋了時人對於城市生活的體驗。該書使用史料豐富，用語生動，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從話語、感知等直觀感受的角度來探討城市空間的努力。在第三、四章，作者用圖集、客談等圖文資料詳實地解讀時人對於南京城的印象，生動而形象，令讀者有身臨其境的切實體會。

該書稍微值得商榷之處，首先在於作者在學術史回顧中，沒有對當代從文化史角度探討城市的議題作出梳理與回應。正如李孝悌所言，「從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所作的城市史研究，在過去一二十年內取得了輝煌可觀的成績」。比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的《清初揚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李孝悌主編的《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等作品都代表了中國城市史研究在典範上的改變，而在

書中均未有提及。

其次，第一章中作者用以論證城市自治來源於國家代理與當地居民的共同合作所使用的主要材料，在用語中並沒有加以中文注釋。作者稱丁賓的改革是由五步組成的構建共識的機制，第一步為 face to face interview，當中提到“ Each *pu* in Nanjing delegated three to four representatives, including both rich and poor residents, to meet with Ding in person on a designated date ”。查丁賓所撰〈征錢雇募總甲以蘇軍民重困疏〉，這一步為「面審」，原文中的用語為「乃將各城所遞鋪冊分開日子，每鋪點出公正人役並貧人富人共三四人，先期約定某鋪某日到於都察院，當臣之面稽查鋪冊內人戶有無房屋門面隱塌，並相應優免人數……」。明顯可以看出，整個「面審」是由官員主導的，「點出」、「稽查」等辭彙說明官員與百姓的地位差距。而作者在翻譯材料時大量使用“interview”、“public hearing”、“town hall meeting”等辭彙，又未附以原來的中文辭彙加以注釋，容易讓讀者產生誤解。

黃素娟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Faiths on Display: Religion, Tourism, and the Chinese State.* By TIM OAKES and DONALD S. SUTT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viii, 283pp.**

John Urry 在其名著 *The Tourist Gaze* 中，分析「觀光客的凝視」如何改變了世界。觀光客帶着追求體驗「真實」的異文化的期望，進入觀光區。被「凝視」的本地人則往往為了滿足觀光客的期望，而調整自身的文化以配合觀光客想像中的「真實」異文化。「觀光客的凝視」如何改變當代中國，近年來已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Faiths on Display* 一書的獨特之處，在於把焦點集中在充滿矛盾與衝突的宗教領域。此論文集的編者在「導論」中指出，國家、宗教與旅遊這個視角，能夠提供很好的切入點，以了解「在此深刻的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國家政權的掙扎、兩難與妥協。」（頁13）論文集共有九篇論文，另外再加上編者的「導言」及華若璧 (Rubie Watson) 的「後記」。論文的作者來自不同的學術背景，當中包括了人類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及人文地理學家。而九篇文章分別討論不同的地域，包括山東泰